

## 2006 年修訂學生版緒言：

*Leah A. Lievrouw and Sonia Livingstone*

在二〇〇一年中期，《新媒介科技手冊》(Handbook of New Media)第一版手稿於倫敦付梓。在該年版本中，我們與各章作者針對新媒介科技的歷史、角色、功能、意義與內涵提出各種觀察，及其在社會、文化與制度環境的各種應用。我們當時認為網路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研究，正迅速地以跨學門、跨專業和跨觀點的方式散佈開來，而這也是該書所提各類觀點中最真實的。然而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如果要說有什麼是當時未能提到的，我們可以說：在第一版所指出的擴展及分化，發展速度比預期的來得更快。在二〇〇一年版的緒言中(亦收錄在本書的「緒論(二)」)，我們曾提到：在進行新媒介研究的調查及綜合時，我們很難僅以某單一觀點為依據。即便如此，在新媒介研究呈現的各種性質之中，「智識方面的兼容並蓄」以及「開放性」這兩項性質，正是研究的可貴之處。我們當時出版該手冊，用意就如目前這個版本一樣，旨在對新媒介研究紛擾割據的情形提出矯治。正因為這種「巴爾幹半島化」的傾向，新媒介研究分裂為數十種專門學術範疇，彼此之間未能進行溝通。

在第一版中提到的變遷，有些很容易預測：新媒介(在羅列出來的新媒介中，以「網際網路」作為一種原型)已成為一種日常技術，在普及程度發達的國家中與社會相結合，完全融

入日常生活中。新媒介並未取代舊媒介，一如廣播並未在二十世紀中期取代平面印刷媒介。實際的情形是資訊及傳播環境已變得更個人化及商品化，並整合了印刷品、聲音、靜態及動態影像、廣播、電信、電腦、以及其他的傳播及資訊分享模式和管道。

由上一段可以看出，新媒介與其他媒介及資訊來源也持續同步進行匯流，差別在於：一九九〇年代注重科技產品的推陳出新及科技革新的速度，二〇〇〇年之後則較重視產品精緻化及應用多元化。資訊傳播科技(ICTs)之所以從革命性質過渡到日常性質，部分肇因於兩項事件。不論在第一版緒論中，或是在第一版各章中，皆未能預測這兩項事件。首先，二〇〇〇年發生了網路經濟(dot.com)泡沫化，網路商務榮景一夕之間破滅。其次，該年年尾發生了九一一事件，人們很快意識到：全球科技網路雖有可能受激進份子利用，但亦能用於抑制這些激進理念。

經濟前景下修，加上恐怖主義的暴力陰影盤旋不去，兩者皆可鮮明地見於大眾媒介的描述，迅速冷卻了許多分析家所顧慮的資訊科技產業「過熱」與投機情形，同時也引發了新的要求，即須提出更為安全、穩定，而且普及的資訊傳播科技系統。大眾原本關切新媒介的創意、新奇與風險，後來轉為關切新媒介的管制、可靠程度與安全；學者所提出的社會變遷觀點，也由革命論點轉移至演化論點。二〇〇四年，《新媒介與社會》(New Media & Society)發行五週年特刊號，其中幾位撰稿者提到：過去五年來資訊傳播科技變得平凡無奇，這反而值得關注。另一項值得注意之處在於：為了滿足生活的各種需求、生活常規以及期望(包括對「傳播」本身所抱持的期望，以及「傳播」在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資訊傳播科技進行了「同化」(assimilation)及「重新建構」(reconfiguration)(Lievrouw, 2004)。

以上所提及的各種改變，並未令新媒介研究喪失動力。事

實恰恰相反。正因新媒介獲致了驚人的成功，學者目前更須面對各種新問題，包括新媒介的規模與能力、網路建構與基礎建設的健全程度、國際法制與國際管制架構、民眾信心、以及安全與電子犯罪(參見 Livingstone 即將出版的新書)。在新媒介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之後，學者也必須提出更為豐富且成熟的理論。在本書中，各章執筆者檢視了關於變遷的各種宣稱，衡量證據，並試圖釐清觀念。執筆者據此指出了前方的各種路徑，但也保持合理的懷疑。此外，執筆者也一貫地體認到，這些研究固然呈現出各種深刻的觀點，但亦有其侷限之處。

社會創新及科技創新的目標不斷呈現變動，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持續追逐這項不停變動的目標。在過程中，我們已記下幾處里程碑，例如在上述《新媒介與社會》的特刊號中，作者群之一的威爾曼(Wellman, 2004:124)提出了「網際網路研究的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始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威爾曼稱其為「專家學者爭先提出預言」的時期，亦即樂觀地頌揚網際網路所具備的潛力及網路所能引發的轉型。然而，其中亦零星穿插著懷疑論者所提出反科技烏托邦(dystopian)預測。後來，隨著世紀之交的網路經濟泡沫化，第二時期的研究轉為著重於更為嚴格的證據探求，對網際網路的使用以及使用者進行記錄。這種情形就如威爾曼及赫松絲薇特(Wellman and Haythornthwaite, 2002: 4)所述，學者在研究網際網路時，開始視其為「從天上掉落凡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目前則屬於第三時期，我們希望本書在改版之後，能對此時期做出貢獻，亦即有助於從「記錄」轉移至「分析」(Wellman, 2004: 27)。

## 壹、定義的重新檢視

在第一版對新媒介進行定義時，我們拒絕僅以特定的科技

特徵、管道或內容來作為依據。相反地，在提出定義時，除了科技方面的因素，我們亦刻意融入社會、政治及經濟因素，將新媒介定義為「各種資訊暨傳播科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情境」(參見本書原文第 23 頁)。此外，我們亦依據執筆者絲塔兒及鮑克(Susan Leigh Star and Geof Bowker)所提出的看法，明確採用了三項要素，作為新媒介的基礎架構：(1)用以進行傳播或傳遞資訊的器物或裝置(artifacts or devices)；(2)在從事傳播或進行資訊分享時所進行的活動及實務；(3)圍繞著這些裝置及實務而發展出來的社會安排或組織形式。在這本經過修訂的手冊中，我們以這些項目為依據將各章重新組織，並將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檢視文化及社會情境之中的各種實務；第二部分將焦點置於科技本身及科技設計與發展；第三部分則採取鉅觀層次，從制度面來探討如何對新媒介科技及實務進行組織和管理。在劃分這三大部分之後，我們已要求各章作者在進行主題探討時皆須提出背景回顧，即該研究如何達到今日的面貌？提出了哪些假說？遭遇哪些問題？該研究又與哪些領域產生交集？

當然，不論何種科技(不僅限於資訊傳播科技)，皆可從「器物」、「實務」以及「社會安排」來著手以進行範圍設定及分析。為了進行傳播研究及相關領域的研究，科技在今日所引發的核心問題就是：相較於舊式的資訊及傳播科技，新媒介在器物、實務及社會安排方面所呈現的特徵是否有異？答案若為肯定，則差異表現於哪些方面？

在進行媒體研究時，長久以來一直依賴「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理論及現象。若要研究新媒介，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這些理論及現象，這也是我們所得出的主要結論。在大眾媒介的年代中，有一項相關但不同的架構，由三部分組成：產製(production)、文本(text)以及閱聽人(audience)。這三個部分主導了媒介研究及學術界，就如同我們在上文所提的，不論產製、文本或閱聽人皆是基本而不可或缺的，也在各種不同學門中引

發討論，令媒體研究蓬勃發展。然而，我們至此所列出的兩種 3  
架構，其間存在著重要差異。兩者相較，器物、實務或社會安  
排不僅範疇比產製、文本以及閱聽人廣泛，而且也更呈全面「社  
會化」。從先天上來說，前者也受到文化及歷史的影響<sup>A</sup>

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由三要素所構成的基礎架構之中，我  
們並不事先指定任何既定的關係。對於產製、文本與閱聽人之  
間所存在的線性關係(亦即產製創造出文本，而文本對閱聽人  
產生影響或帶來衝擊，這種情形與「傳送者－訊息－接收者」  
的傳播模式相同)，傳統大眾傳播學已耗時數十年欲從中掙  
脫，近來也極力拆散這種線性關係。在新媒介研究中，並不假  
設這種線性關係是必要的，正因如此，我們同時強調社會形塑  
(social shaping)及社會結果(social consequences)。依據克倫  
(Michel Callon)的說法，社會形塑與社會結果組成一個合奏團  
(ensemble)。器物、實務與社會安排這三者間的動態連結，以  
及三者間的相互依存性，正引導我們的分析焦點。然而，這些  
動態的交互關係並非永遠皆具彈性。我們用基礎架構  
(infrastructure)一詞，用意即是或多或少能呈現出：器物、實務  
及社會安排(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可以是日常的、鞏固的、體  
制化的、固定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儘管程  
度不一。

如同本書許多章節將呈現的，新媒介研究受到後工業理  
論、晚期現代理論或後現代社會理論的影響極深，這些理論所  
持看法的在於「出現了新經濟秩序：這種新經濟秩序的特徵在  
於將資訊及理論知識置於中心位置，也在於從貨物製造轉移至  
服務業的社會」[Golding, 2000: 169; 參見本書韋伯斯特(Webster)  
所著第二十一章]。這種轉移的特徵包括資訊商品化、資訊傳

---

<sup>A</sup> 當然，不論產製、文本，或閱聽人，亦皆會受文化及歷史影響。  
然而，在傳播研究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傳統中，目的即在  
於讓這些現象能脫離構成這些現象的情境。

播科技(ICTs)的廣泛散佈、訊息形式及內容形式的多樣化、各種交互連結的社會及技術網路，尤以「資訊工作」(information work)的興起及抽象知識特別受到重視。若採後工業或資訊社會框架來解釋新媒介技術，上述特徵皆為不可或缺的要素(Schement and Lievrouw, 1987)，也被新媒介研究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在大眾社會及大眾媒介理論之中，上述特徵卻不具重要性。

新媒介研究已累積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文獻，從這些文獻中可以看出，原本由大眾社會所呈現的外貌較具秩序，然而這樣的外貌在許多方面已轉變為新興的環境，即各種網路形式、網路角色、網路關係以及網路動力。不論大量製造、大量散佈或是規模經濟，現在皆須與下列三者進行競爭：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累積優勢過程(cumulative advantage processes)以及冪次法則(power laws) B 在先前的研究中，檢視了閱聽人、訊息接收與影響，然而目前還必須解釋下列要素：使用者與用途、互動性、重新建構以及互相影響性。在過去，線性敘事、文類與特定媒介技術相連繫(小說、好萊塢電影、黑膠唱片、犯罪影集)，現在則被納入具備超連結的混種內容中，經由各種不同的管道產生並進行分享。資訊、傳播及中介彼此複雜地連結在一起，而且已不僅只是傳播研究或一些相關專門研究的領域。今日，對這種現象極感興趣並加以研究的，包括了社會科學、藝術及人文科學。因此，新媒介研究有必要採用各種跨學門途徑，儘管這些途徑帶來了理論及方法學方面的挑戰，並結合各個不同的領域，雖然有時也造成這些領域間的衝突。

因此，傳播及媒介研究正身處概念及跨學門的十字路口。

---

B: 若欲更加瞭解網路的各種外部性，參看本書執筆者李弗羅(Lievrouw)所著章節。胡伯曼(Huberman, 2000)則為「累積優勢過程」以及「冪次法則」提供了簡明的解釋，尤其是這兩者與網際網路相關的部份。

如我們在下文將呈現的，現在該重新思考「大眾」在科技及社會中的角色，新媒介之所以被稱為「新的」，之所以迥異於過去的大眾媒介，有一項論點認為原因在於：新媒介科技在發展時，採用了社會形塑的發展方式，並且造成了各種社會結果。在對於「大眾」進行再思考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項論點。

## 貳、資訊傳播科技的社會形塑

「社會形塑」(social shaping)一詞借用自對「科技」所進行的研究。在一九七〇年代及一九八〇年代對科技的研究中，若想批評強烈的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並且轉為朝向強烈的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ism)，「社會形塑」這個詞彙屢被提及(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數十年前對大眾傳播進行研究，並提出觀察：「在科技決定論中，研究與發展被假定為自我生成的。新科技發明被視為發生於一個獨立空間中，造成了新社會或新的人類狀況」(Williams, 1974: 13，粗楷體字為原作者所加)。在近來的文化研究、媒介藝術及設計研究中，談到新媒介時往往採取科技決定論的觀點(例如 Manovich, 2001; Poster, 1990; Stone, 1995)。然而，在社會科學的新媒介研究者中，若以科技創新來充當原因，社會充當其結果，這種論點事實上受到一致反對(例如參見 Woolgar, 2002)。學者們採取相反的看法：「科技並非獨立於社會之外，而是讓社會得以存在的因素之一。換句話說，科技是構成社會的元素之一」(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23)，而這項社會決定論觀點，也傳遞至傳播研究、文化研究、資訊研究，以及一九八〇年代的其他領域。在傳播研究中，原本普遍可見採取科技決定論的「新社會」(new society)論述，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則被社會決定論取代。社會決定論接著成為新

媒體研究的主要觀點(Boczkowski and Lievrouw, forthcoming; Livingstone, in press)。

本書將「社會形塑」列為副標題，看似與強烈的社會決定論觀點連繫在一起，然而，我們所提到的社會形塑意指一種較為雙向的形塑過程，由科技發展與社會實務來共同決定(細部討論參見 Boczkowski, 2004)。如我們在第一版緒論所提到的，「一方面，對於傳播管道(agency)及行動(action)表達了關注；另一方面，則關注各種社會效果、社會結構以及社會影響」(Boczkowski, 2002: 11)。我們引述拉圖(Bruno Latour)的一段重要看法：「科技就是社會的固久化」(Latour, 1991: 103)。對於如何創造科技、如何瞭解科技、以及如何使用科技，人們一直具有選擇。然而，若科技變得非常廣泛而融入生活，且被視為理所當然(例如電話、電視、報紙出版以及愈來愈普及的網際網路)，這些科技也往往會對現有選擇範圍造成限制。這種情形也是一種社會過程，就如阿格雷(Agre)所述：「每一個系統皆能承載一定數量的詮釋，而詮釋的範圍大小，則端視系統被賦予什麼樣的論述」(Agre, 2004: 27)。因此，科技、行動、社會情境彼此相互影響，為不可分割的現象 C

不論科技、行動或社會情境，皆可置於「晚期現代」這一

---

C 若將科技決定論視為一項「科技理論」，較之於將科技決定論視為一項「社會理論」，兩者有何區別？麥克肯賽與瓦克曼(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探討了這種區別，可適用於此。若作為一項科技理論，「科技決定論」顯然是失敗的：科技創新完全是一項社會過程，來自於概念、設計、產製、行銷、散佈、挪用、使用，以及結果。然而，若作為一項社會及社會變遷的理論，我們或許可以同意麥克肯賽與瓦克曼(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3)的看法：科技決定論若作為一項社會理論，「有部份是說得通的」。換句話說，若我們充份瞭解科技是社會的產品，其中包含了各種人類關係，我們就可以賦予科技「行動者」的角色，並與其他的行動者並列，以便於我們對各種社會過程進行辯論及討論，不論這些社會過程為教育、政治生活、兒童、勞工，或是其他。然而，這種看法仍有其不足之處。原因在於：「科技決定論雖然可以部份作為一項社會理論(科技不僅在實體及生物方面具有重要性，也影響了人類彼此之間的關係)，然而，正因科技決定論不足以作為一項科技理論，社會中的政治生活亦因此變得貧乏」(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9: 5)。



項較為廣泛的分析框架之中，運用此框架可以指認出多種關於「變遷」的向量。阿巴杜賴(Appadurai, 1996: 33-6)指出了五項關於「變遷」的關鍵層面，循著這些層面看待標題的「社會形塑」及「社會結果」時，我們可以對其中的「社會」兩字進行分析。這五項層面是：族裔景觀(ethnoscape，關於個人、身分認同以及離散社會的景況變遷)、科技景觀(technoscape，流動的、網路化的科技建構)、金融景觀(financescapes，全球資本的特性)、媒介景觀(mediascapes，資訊的散佈、影響以及閱聽人)以及理念景觀(ideoscapes，藉由各種理念及反理念，將形象及想法與國家的權威連繫起來)。不論是否贊同這些景觀(尤其把科技景觀與媒介景觀分開)，阿巴杜賴的目的與本書各章的許多作者一樣，在於檢視經濟、文化及政治的分離之處，這點極為重要。而之所以產生分離，肇因於各方匯流後所產生的互動，因此為「社會」兩字帶來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概念。

## 一、再組合

在第一版分析「社會」這項動力時，聚焦於兩項與之相關的社會形塑模式，藉由兩項模式來探討新媒介與傳統、線性、一對多的大眾媒介過程及效果，我們相信能將兩者區分開來。第一種模式是再組合(recombination)，亦即「在相互連結的科技網路及體制網路中，持續混合現有的科技及創新發明」(參見本書原文第 23 頁)。「再組合」具有兩種主要形式：趨同 5 (convergence)及趨異(divergence)。這兩種形式可見於下列各項發展：新媒介科技的發展、訊息形式的發展、社會實務的發展及文化／經濟體制的發展。新媒介科技來自於人類持續不斷的行動，也出自於現有的技術及文化資源，因此新媒介科技得以不斷地「再更新」。在創造新媒介科技時，雖然往往出自於特定目的及用途，但這些新科技往往用於原本預料之外的用途。

這些新科技可能遭遇再發明、重新建構、遭破壞、被改裝、受駭客侵襲，或是遭到漠視。藉由這項過程，加上往往於預料之外的結果，強化了常伴隨著資訊傳播科技而來的「新式的」感覺，也促使資訊傳播科技產生重要的變遷。

當然，「再組合」加上「新奇感」，依然與新媒介設計及使用連繫在一起。各種新的特色或使用方式持續被引介出來，儘管目前這些特色及使用方式傾向把現有的功能加以融合、開展或延伸，而非提出全新或令人不熟悉的功能。如絲塔兒與鮑克(Star and Bowker)於第十一章所指出的，如同其他各種業已建立的基礎架構，新媒介亦「建立於既有基礎之上」。最遲在二十世紀晚期，大眾媒介已經穩定地演變為幾項主要的管道或形式(原因在於頻寬有限，以及技術標準與正式標準皆已獲得建立)，然而新媒介的情形卻非如此。新媒介不論在形式方面或種類方面，皆持續呈現分枝、再組合與擴張。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64)提到，舊媒介往往會成為新媒介的內容。在今日，這種情形已經成為一種持續進行的「媒體融合」(remediation)過程。在這項過程中，新媒介對舊媒介進行取用、再塑造或吸收。因此，不但新媒介得到塑造，人們熟悉的媒介亦受到再塑造(Bolter and Grusin, 1999)。

隨舉幾例，幾年之間，「部落格」(blog)已從一項奇特的新玩意兒，發展為普及且受歡迎的線上傳播模式。在製作部落格時，採用了便於使用的軟體，不論網頁圖像、超連結，或是舊式的共同參與電腦通訊形式(例如電子佈告欄、視訊會議以及電子郵件)，皆整合至部落格的製作軟體中(Coleman, 2004)。同樣地，在傳送手機簡訊時，運用了電報式的精簡用字風格、先導研究計畫網路(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縮寫為ARPANET)時代的「情緒圖示」(emoticons)、行動電話可攜性及個人對個人通訊管道結合在一起(Ling, 2004)。多人遊戲運用了網站、超連結及聊天室作為門戶以引

導成千上百的使用者進入豐富動畫及劇院效果的線上世界，在同一時間進行參與及互動，兼具「玩家」及「觀眾」兩種身份(Gee, 2003)。上述各例子不僅令各種資訊及通訊的可能性得到拓展，提供新式及不同形式的社會關係及經驗，還對較為舊式的形式(例如日誌、語音電話或電玩)進行「媒體融合」(remediation)，而非取代或置換。

## 二、網路隱喻

新媒介的第二種社會形塑模式，即網路隱喻(network metaphor)，認為：

點對點的網路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組織及技術組織的原型。網路意味著一項大範圍且多層次的交互連結，在連結中容納了許多端點或節點(個人、群體、機器、資訊的集合、團體組織)。各節點之間的連結，不論處於系統中哪個位置，皆必須視實際需求而被創造出來，或是被捨棄。每一個節點皆可作為訊息的傳送者或接收者，或是同時作為傳送者或接收者(參見本書原文第 24 頁)。

不論大眾社會、大量產製及消費或大眾媒體，通常皆與階層式、單向配送構形連繫在一起。但由上述觀點來看，網路脫離了這種構形。社會若被視為「由各個網路所組成的網絡」(Castells, 2002)，學者就會重新思考曾居主導地位的「一對多」大眾傳播框架。此外，這種「一對多」的大眾傳播框架，較之於「一對一」及「多對多」(或 n 對多)的傳播模式，兩者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對此，學者正在重新思考。不論意欲管理社會關係之中的權威、信任、參與，或是意欲對資訊進行管

制或散佈，這些變動且多層次的構型皆具有重要意涵。在進行傳播及資訊的尋找及分享時，已經出現了各種新式且混種的模式，其中納入了每一項有助於眼前目的的傳輸型式。上述「n對多」與「大眾傳播」或「廣播傳播」間的區別，也許正在被各種新式且混種的模式所取代。當然，在先進科技社會中，若要進行文化、社會或科技的論述，皆愈來愈受「網路隱喻」所主導。舉例來說，不論贊同或批評「全球化」，「網路隱喻」皆是這兩種立場背後的基本假設。此外，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也浮現出諸如安全、社群、移民、交通、貿易、政治動員、資訊流動等論述，在這些論述之中，網路隱喻亦佔中心地位。

## 參、資訊傳播科技的各種結果

新媒介科技的結果(亦即在雙向形塑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科技結果)，也令新媒介科技與下列的「大眾」項目區分開來：大眾媒介系統、大眾傳播過程及大眾閱聽人。在第一版中，我們特別討論兩項結果：普遍性(ubiquity)以及互動性(interactivity)。

### 一、普遍性

「普遍性」(ubiquity)意謂著，「若在社會中應用新媒介科技，則社會中的每個人皆會受其影響，不論個人是否親自使用了這些科技」(參見本書原文第 25 頁)。十多年前在美國提出了「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存在，可作為「普遍性」的一項例子。更準確地說，可證明「普遍性」是人們需要且又無可避免的(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1995; 1998)。

「數位落差」這項議題後來在全世界激發了許多實務方面的研究和評論，支持及批評者皆有。有些學者認為資訊傳播科技在分配方面呈不平均及不平等，再加上能否具備能力來運用資訊傳播科技，這兩種情形意謂著一項明確且急迫的社會問題。其他學者則觀察各社會群體間的數位落差，探討其程度及意義；或認為只要靜待科技普及，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參見 Bucy and Newhagen, 2004; Compaine, 2001; Gandy, 2002; Lievrouw and Farb, 2003; Light, 2001; Loader, 1998; Murdock, 2002; Selwyn, 2004; Warschauer, 2003)。這些辯論引發了不同的政策及管制計畫，例如：美國對公立學校進行「教育優惠率」(e-rate)的補助、歐盟「資訊社會」方案，皆欲消弭存在於各種族及經濟族群、省份、鄰近地區、國家、區域間的數位區隔及數位落差問題。

這塊領域吸引了許多目光及相關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在於其所依據的假設：資訊傳播科技的普遍性有助公眾利益。然而，對於是否應毫無保留地全力推廣資訊傳播科技、網路取用管道增加，或其他新媒介科技取用管道的增加是否全然皆為好事，這方面的分析卻出乎意料地少。在談到資訊傳播科技的取用管道模型時，通常皆以電話為例子。電話被視為一項基本必需品，因而在進行管理及管制時，皆以「普及服務」或「普及取用管道」的原則或義務為基本依據(Lievrouw, 2000)。相較之下，若談到大眾媒介的普遍性(或是其缺乏)，一般並不以上述方式來作為框架。例如，在推廣電視及廣播時，若想知道是否存在著「電視落差」或「廣播落差」，並沒有這方面的文獻可供參考。相反地，對於控管或減少看電視的時間(減少兒童收視)，或是對於成人觀看電影、錄影帶及打電玩時所應進行的分級管制，倒是投入了大量的研究 D

---

D 從歷史上來說，大眾媒介之中唯一獲得全力推廣的，一直是印刷文字的「識字」及「閱讀」。西方已開發社會中，「識字」一直被視為是下列事項的先決條件：經濟參與、社會／政治參與、自我效能以及自決。

「普遍性」在受到期待之後，如何影響資訊傳播科技的發展及使用？另一個例子為愈來愈普遍使用且用途寬廣的「行動科技」(mobile technologies)。藉由電晶體、微晶片以及近期的奈米科技，已經能製造出更小型且更利於攜帶的電子裝置。因此，對於這些裝置能用於何處、由誰使用、用於何種目的，所抱持的期望亦產生了轉變。今日，對於「行動性」(mobility)所抱持的期望，已不僅在於將裝置縮小，還在於能適用經共通標準而建立的普遍互通性傳遞網路(例如，行動電話的三頻或四頻技術、無線上網所使用的 802.11B / 藍芽 / wi-fi 技術; Ling, 2004)。在傳統的工作場所、教室，或家庭環境中，所安裝的媒介皆為大眾媒介，即科技設備放置於固定位置，且供公眾使用。相較起來，今日的行動科技被設計作為個人工具或個人配件，不論使用者、服務或資源所處的位置為何，藉由行動科技皆能提供管道來傳遞個人化內容及個人化通訊服務 (Livingstone, 2002)。

## 二、互動性

不論在媒介管道或內容，「互動性」為第二項足以區別新媒介與早期大眾媒介的「結果」，而且普遍與新式管道連繫起來。亦即各種媒介科技在提供使用者「選擇資訊來源，以及與

---

「識字」是一項基本必需品，也是基本權利，因此必須提供公眾教育、圖書館，以及郵政服務。近年來，「識字」與「閱讀」這兩項詞彙，已被借來討論其他種類的媒介使用及消費。因此，其他種類的溝通及資訊技能已與「識字」相提並論。這些技能也如同「識字」一樣，被認為是一種權利(參見 Kellner, 2002; Kress, 2003; Livingstone, 2004a; Luke, 1989; Manguel, 1996; Snyder, 1998)。電話的使用亦為另一項類似的情形。自從一九三四年美國的電信法案(Communications Act)之後，電話系統就被定義為一項普遍性服務。相較之下，一直到最近幾年之前，電話則不被認為是一項大眾媒介，甚至根本不被認為是一項媒介(Sawhney and Barnett, 1999)。

其他人互動」時，可以讓使用者擁有選擇，並且讓使用者取用(參見本書原文第 25 頁)。在各種新媒介管道中，展現了立即性、回應性以及互動性的社會臨場特質。相較於大眾媒介，新媒介管道不論在品質或實質方面，皆呈現出不同的經驗(「互動式」這個詞彙，有時應用的太過廣泛，甚至連電視遙控器也可稱之為「互動式」。容或如此，較之於新媒介仍顯不同)。媒介所帶來的中介式互動本質及品質為何，仍持續引發辯論，尤其若與「面對面」的對話進行對照，且將「面對面對話」假定為人際溝通的「理想」模式(參見 Lievrouw and Finn, 1990)。然而，長久以來在探討新媒介及大眾媒介時，「互動性」已被視為一項明確的差異(參見 McMillian 所著本書第十章；Ball-Rokeach and Reardon, 1988; Bryant and Street, 1988; Rafaeli, 1988; Reeves and Nass, 1996; Rice and Associates, 1984; Rogers, 1986)。

#### 肆、從大眾媒介到中介

由上述可知，若相較於大眾媒介，當今的媒介傳播不論在過程或效果方面皆明顯不同：當今媒介是再組合的、網路的、普遍的及互動的。不論新媒介研究或學界，皆已將論點由各種大眾社會理論移轉至後工業或後現代社會理論。這些關於媒介及傳播研究的發展，整體來說還能呈現出哪些意涵？

如第一版所述，此一領域仍存在一個持續的問題突顯了以下的困難：若藉由媒介科技及資訊科技來探討人們的社會性以及各種文化方面的實務，可以找到哪些相關的共有特徵？二十世紀末期，隨著大眾傳播的主導勢力開始瓦解，研究「閱聽人」的學者已準備尋求不同的詞彙，用以瞭解媒介的力量，亦即不再採「效果」或「影響」方面的詞彙，而改採「主動的閱聽人」

(active audience)(Livingstone, 2004b)、「擴散的閱聽人」(diffused audience)以及「內嵌的閱聽人」(embedded audience)等觀念；或是，更廣泛地來說，朝向各種「新閱聽人研究」(new audience studies)(Gray, 1999；另請參見 Ang, 1990; Hartley, 1998)。這種重新思考，是由詮釋學派及民族誌學的轉向而得到啟發，然而整體來說，這兩方面的轉向在所有社會科學中皆造成了波動，不僅限於媒介研究領域。此外，上述關於「閱聽人」的再思考，仍是以「電視」為主要研究對象，儘管電視已變得較為全球化、多樣化，甚至變為「互動式」，但主要仍用於家庭休閒娛樂，直至目前依然如此。

由於娛樂、教育、工作與公民活動、人際溝通的匯流，資訊傳播科技的「趨同」同時受到引發及形塑。由於上述的趨同，在看待人類與資訊傳播科技間的關係時，必須從根本層面上重新思考，也須更瞭解資訊傳播科技。今日，由媒介所引發的內容及互動，在社會方面是多樣化的(而非直接施加給大眾)，各管道在科技方面趨同(而非採取相異的系統)，傳播過程則是互動式的(而非一對多，亦非呈分離的產製者與接受者角色)。正如我們在第一版中所言，「藉由新媒介及資訊科技，開啟了更為新式、更為互動的媒介接觸模式，包括：玩電腦、瀏覽網站、搜尋資料庫、寫電子郵件以及回應電子郵件、造訪聊天室、線上購物 等」(Lievrouw and Livingstone, 2002: 10)。此外，後來還加入了其他活動：部落格、快閃族(mobbing)、簡訊傳送、即時通訊、冒充網路位址(spoofing)及其他尚未提及的活動。若把新媒介的使用、應用、活動及內容加以列表，這張表會持續呈現更動，而表中所列名詞，有些是個人的，有些是集體的，有些則呈現兩者混合；有些描述通訊內容，有些描述通訊行動，有些則兩者皆描述。

顯然地，若要捕捉出這種活動的多樣性，單靠閱聽人這個詞彙是不足夠的。我們並不能使用網際網路閱聽人(internet



audience)這樣的詞彙，僅管有學者如此嘗試。有更多學者嘗試以「使用者」(user)這個詞彙來代替但亦不理想，「使用者」這個詞彙太過廣泛(並不屬於資訊或傳播所獨有)、太過工具式(如果人們是電腦或電話的「使用者」，他們也可以是下列物品的使用者：筆、電池、洗衣粉、汽車以及其他並不涉及人際接觸的物品)、太過個人式(「閱聽人」這個詞彙，呈現出集體的地位及力量，也呈現出「互動」所具的關係感及共同享有的瞭解。然而，這些意涵並無法由「使用者」這個詞彙來表現)，而且太過物質(所指的是通訊所用的工具及技術，而非其內容、意義、互動或共同享有的瞭解)。網際網路使用者(internet user)這項詞彙若是行得通，僅因這個詞彙是完全模糊的：這個詞彙不把任何一項事物排除在外；對於人們如何與網路接觸以及如何瞭解網路科技，這項詞彙也並未提出任何明確的說法。「網路使用者」是一項空洞的名詞，它將「使用」以及「使用者」加以同質化，且置於同一個類別之下，若遇到需要比較的時候，僅以「非使用者」這樣同顯空洞的說法來對照。因此，在接觸目前的資訊傳播科技時，選用的詞彙必須面對兩項問題：如何傳達出「新式的」感覺，以及如何明確將傳播與資訊連繫起來。

那麼，我們應使用什麼詞彙？與其他的詞彙相較，若使用「人」(people)這項詞彙，並不稍遜，甚至比一些其他的說法更好。這項詞彙並非了無新意：在談論社會科學以及資訊傳播科技的工程面時，試著用人來代替使用者，我們立刻會發現：不論人類的利益、關注事項、知識或權利，皆立刻躍昇為焦點(試想，若以下列講法來代替「人」，感覺會有多麼不自然：「閱聽者」的公民潛力、「使用者」的權利、以及「消費者」的創造力)。人這個詞彙可以捕捉人的個人性質，也可以捕捉人的共同性質；對於人所具有的能力及利益，這個詞彙皆呈現中立的立場，卻能明確地替人的需求及權利而發聲，並把人的多元性及多樣性視為理所當然。人這個詞彙，適用於每一類學門，

無須引介新的術語，而且將「我們」(亦即旁觀者)納入這項分析框架之中。此外，人這個詞彙若用於英語之外的語言，也是很方便的(在別的語言中，不見得能立刻找到閱聽者、使用者以及消費者的同等詞彙)(Livingstone, 2005)。

「人」這項詞彙，也將人的能動性及行動置於新媒介研究的核心。如此一來，被視為中心的，即非我們施加給新媒介研究的各種條目或類別，亦非進行新媒介研究時使用的各種裝置。同樣地，若較之於「大眾社會」之中大多數的概念，「人」這項詞彙亦與之相異，因為在大眾社會之中，個人或是團體的能動性皆較不受重視或受到忽略；而且因為大眾傳播在看待各種傳播行為時，主要視其為對於刺激所產生的反應，並且以「接收」及「效果」等詞彙來解釋，而非以「行動」來解釋。有趣的是，有些媒介學者試圖拯救並重建「閱聽人」這項詞彙，藉由強調閱聽人成員的能動性，並將「閱聽人」與具創造力及自我組織的公眾並列(Livingstone, 2005)。這種情形顯示了焦點的轉移：從探究與媒介間的簡單關係，移轉至以日常生活中的能動性為依據，來進行較為情境化的解釋。

如果我們嚴肅地看待能動性及行動，就必須賦予媒介及資訊科技新的框架。透過這種新框架來看待媒介及資訊科技時，不僅視其為有力的訊息生產裝置，也對行為及社會產生影響；亦視其為各種資源，可以為人們提供各種機會以培養其能動性；亦視媒介及資訊科技為各種工具，能供人們利用以產生行動；若將新媒介視為能動性及行動的資源，即從位居主導的大眾媒介觀點(亦即媒介是相較之下較為固定、穩定，且去個人化的體制式實體，可對人們造成影響)，轉移至另一項觀點，即納入人與媒介所共同進行的活動，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如此一來，在進行傳播方面的研究及學術時，我們即重新朝向「中介」的過程。

先前，我們將新媒介定義為傳播及資訊的基礎架構，由

各種特定型式的器物、實務以及社會安排所組成。這些組成成份以不同方式受到社會的形塑，並產生各種社會結果，並以這些結果來作為新媒介的特徵。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將**傳播**(communication)定義為一項經過協調的行動，能夠達成瞭解或進行意義分享(Rogers and Kincaid, 1981)。對於**資訊**(information)，則可以定義為經歷傳播過程後，經過組織的、被表達出來的，以及可被瞭解的表現或成品；「傳播」與「資訊」以交纏的方式連繫在一起，而且相互依存(Lievrouw, 2001)。因此，對於傳播方面的動作及表現，可藉由中介(meidation)來促成、獲得支援，或是加速。「中介」不僅是以科技的方式對傳播過程或資訊產製進行干預，或將科技置入傳播過程或資訊產製之中，還包含了基礎架構的三項要素：器物(例如字母、電路、鍵盤及滑鼠、作業系統、電話交換機、電影資料庫、衛星收視天線、金錢等)、實務(例如手勢、說話、電話或電子郵件禮節、語言、手稿格式、打字、線上檔案分享、時尚、合約法條、電視節目表、部落格等等)以及社會安排(例如單親家庭、唱片公司、智庫、國家電影局、競選活動、社區建言網路、電影製片廠等等)。各種新資訊傳播科技提供了：資訊及傳播行動的普遍性、各種經再組合的取用 / 使用 / 內容模式、各種動態的點對點網路結構、以及個人的參與感及互動性。上述事項皆可被視為當今的中介模式，而這些模式與大眾媒介所能促成者有所迥異。

有幾位學者已提出一項看法：在新媒介研究中，「中介」本身應被視為一個中心框架，原因在於：「在我們的傳播式社會之中，以文本與人之間的各種中介為依據。人藉由文本來進行傳遞，並與他人相遇。這種情形，正如同文本藉著人來進行傳遞，並與其他文本相遇」(Fornas 2002: 104)。而新式資訊傳播科技則為上述的相遇過程帶來了各種特別且具挑戰性的問題。例如，佛赫斯特(Stefaan Verhulst)在討論「新中介生態」(new

mediation ecology)時指出：

由於新資訊及傳播科技的來臨，引發了一項想法：中介的重要性遭到削減，而且我們不再擔心資訊匱乏。這兩種現象皆為我們所見。隨著各種科技的興起，眾人原本預測「去中介」(disintermediation)的過程將會隨之而生。然而，目前我們不得不面對一種「再中介」(reintermediation)的過程，其特色在於：由新的行為者及新的方法來進行資訊的散佈，並且對現實進行框架。對於各種新中介力量所可能帶來的結果，我們才剛開始獲致瞭解 (Verhulst, 2005)。

有些傳播研究學者向來抱持著一種現代主義的觀點，即大眾媒介科技(若加以延伸，就是「中介」本身)扭曲了人際之間的互動，或令這種互動受損。現代主義者認為若非媒介科技作梗，人際間的互動將可呈現出一種理想化、均衡的經驗。這種現代主義觀點亦同樣受到席維史東(Roger Silverstone)批評。他認為若想瞭解今日的媒介，除須瞭解其「字面上」的意義，還須瞭解其「隱喻」的意義。原因在於：不論科技、體制、訊息，或意義，彼此間皆不斷地進行互動及交互影響(Verhulst, 2005: 30)。

從大眾媒介(單一的)轉移至各種網路社會及關係(多元的)之後，不論人對於媒介科技的參與，或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皆產生了相對應的轉變；由大眾閱聽人(雖然能提出強大的集體回應，但影響力僅止於當地)轉移至多樣中介式及非中介式傳播及資訊分享(在這種分享之中，不論集體力量或個別行動，皆彼此互相形塑，而且通常不受限於地方或國內界線)。在本書各單元中皆可清楚見到這項轉變，即便「人」在受到定位以及進行自我定位時，會因身處不同領域而產生很大的差

異。對於新媒介研究者而言，若將新焦點置於「中介」上而非媒體本身，不論其意欲進行批判式檢驗或經驗式檢驗，皆象徵了一種新階段。

## 伍、如何使用本「修訂學生版」手冊？

學術界的出版品若發行第二版，往往僅是改採平裝本，且將第一版照印一次。本書的修訂學生版雖然不採取這種作法，但亦非全部重新改寫。對於初踏入此領域的人士而言，若非專精於本領域，不論學者或高階學生仍能從本書中獲得合乎潮流且全面的介紹。對於研究新媒介的學者而言，亦可作為參考書籍。然而，本書主要的目標讀者為大學高年級或研究所低年級的學生以及授課講師，為這些人士提供一本主要教科書或是必讀的背景讀物。相較於較為入門的教科書，本書更具深度及廣度。本版從第一版取材時，所選取的文章旨在能為新媒介研究的主要概念及議題提供最為清楚的總覽架構。本版的作者群已依據各自專長領域中最新的學術現況及發展，對各篇文章進行修訂及更新。 10

第一版原分為六大部分，我們如今已重新組織且精簡為三個廣泛的領域，分別處理：文化及社會、系統設計與產業、機構與管理。每一章皆著重於單一關鍵議題、概念，或一套相關聯的問題。每一章亦皆提出基本文獻回顧，並結合概念方面的組織或框架，讓這些文獻能被用於更為廣泛的觀點。舉例來說，在課程一開始的簡介部分可以涵蓋上述三個領域。在進階課程中則可將焦點置於其中一或兩個領域。教師也可以依據自身規劃的特別內容或專業來選擇自己所需的章節。

我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方式，其中一項理由在於：今日大多數學生在選讀新媒介研究課程之前，生活背景中便已充斥著

各種科技，不論對於行動電話、個人電腦、PDA、無線網路等等，皆已能得心應手地使用。許多學生也擁有並編寫自己的網頁、部落格，並下載音樂、電影、手機鈴聲，也玩線上遊戲，並與家人朋友一起使用線上聊天室或互傳手機簡訊。此外，亦可利用網路撥打長途電話、在網路上購物(從衣飾到教科書)，並運用科技來組織及參與政治、文化團體。對於十年前甚或五年前的學生來說，今日的學生在科技運用方面要內行得多。

學生每天皆會運用科技，並視其為理所當然，然而，學生通常忽略了科技與各種情境之間的關聯，包括了歷史、經濟、社會或行為。若要學生對新媒介進行批判式思考，他們仍缺乏所需的背景知識，亦即新媒介來自於何處、如何使用、以及系統的建構與運行方式能讓誰得益、令誰受害。這裏所提供的總覽，讓學生能更瞭解本身所進行的傳播溝通，以及所使用的裝置，並且提供學生知識基礎，有助於對未來的媒體選擇及使用賦予框架。

各章作者在面對各自領域之中的關鍵辯論及問題時，已應我們的要求，依各自不同的學術及學門傳統為情境，描述並指認出這些辯論及問題。因此，新媒介的學生亦應密切注意各章節之間的關係。不同的作者是否持同樣的看法？他們的觀點是否能彼此相容，得以在一個特定的新媒介研究領域中共同拼湊出一幅圖像？各學者是否各自為讀者提出新媒介研究中相互競爭的觀點，讓讀者自行選擇要跟隨哪一位學者，並能在各種相異的解釋迷團中選擇自己的路徑？

例如，在蓓恩(Nancy Baym)所著的章節之中，討論了各種線上人際關係，對於新媒介如何加速社群建構，蓓恩的看法與簡考斯基(Nicholas Jankowski)所著章節有相符之處。研讀新媒介的學生也許會問：蓓恩所採的「微觀」分析(焦點置於個人之間的人際溝通及關係)是否契合於簡考斯基所採的「中觀」(meso-level)分析途徑(焦點置於團體及集體)(Alexander et al.,

1987)？對於由媒介所引發的關係以及未來的媒介研究方向，甚至對於最能獲致結果的研究方式，這兩位作者所提出的結論有何異同？若研究媒體在團體中所引發的關係，例如霍琳雪德 (Andrea Hollingshead) 與康崔特 (Noshir Contractor) 所著章節，是否也採用相似的方法，並獲致相似的結果？這兩位學者將焦點置於「網路」，較之於將焦點置於「社群」或「關係」，是否能作為一項更有用的研究框架？

若對本書各部分章節進行比較，亦會浮現出類似的問題。例如，在「第一部分」之中，巴金漢 (David Buckingham) 將兒童視為數位時代新媒介的獨特個人使用者，甚至將兒童視為先驅。在「第三部分」中，佛赫斯特追溯管制框架。大眾在面對新媒介時 (尤其是網際網路)，能藉由這些框架來獲得保護，相較於其他的群體，兒童及法律上的未成年人常常被認為容易遭受不當或暴力媒介的危害，因此需要這種保護法令。然而，一旦將兒童視為容易受傷的高危險群，這種見解是否合乎巴金漢的看法 (視兒童為異質的、尋求樂趣的、願意參與的)？這兩位作者雖採取不同的觀點，但在面對「第二部分」之中麥蜜蘭 (Sally McMillan) 所提出的三種互動性形式時，這兩位作者是否皆將其納入考慮？或者，這兩位作者是否有可能藉由將焦點置於更為新式的互動媒介形式，而令麥蜜蘭所提出的分類得以獲致增添或延伸？在研讀本書時，我們鼓勵學生橫跨各個章節，並採取批評式及比較式的閱讀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很可能是先前預料不到且具啟發性的。

不論學生或教師，對於筆者在本緒論之中提及的看法，以及在第一版緒論中所提及的看法，皆應加以思考。我們已經提到，新媒介之所以異於大眾媒介，在於新媒介發展出「再組合」以及「網路化」的方式，以及新媒介具備的「普遍性」與「互動性」結果。這四項主題如何於其他的章節反映出來？又能反映至何種程度？若想尋求證據來證明再組合、網路隱喻、普遍

性或互動性，該去哪裏找尋？又應如何找尋？我們是否遺漏了其他同等重要的特徵，甚或更重要的特徵？在大眾媒介之中，又有哪些近似於新媒介的特徵？藉由以新媒介研究的文獻為依據，我們提出一項立場：各種傳播研究，應該將主要焦點從大眾媒介轉移至「中介」過程本身。對此，您的看法如何？是否應分別研究大眾媒介與新媒介，亦即使用不同的理論及研究方法？若是如此，這兩種媒介研究分別最適於哪種理論及方法？

本書以韋伯斯特(Frank Webster)所撰寫的章節作為結束。在面對新媒介時，他所抱持的懷疑態度是很知名的。不論政府、科技人士、產業界或大眾文化，皆以諸如「網路」、「超」、「上線」與「虛擬」等等令人目不暇給的詞彙，對新媒介提出過度誇大的宣稱。就如同本書其他章節的作者，韋伯斯特對這些宣稱及詞彙抱持著機警態度，這是很合理的。就如先前所說，來自於後工業、後現代以及資訊社會的各種理論，已對新媒介研究造成了強烈影響。為了判斷「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是否確實已經來到，韋伯斯特提出了一些嚴格的標準。他認為如果我們審視大規模的經濟過程，而非審視客製化的、個人的及互動式的「上網」經驗，我們即會發現：當代社會基本上仍是階層式(hierarchical)的。如同本書其他章節的作者，亦如同長久以來對於資訊社會進行批判式傳播研究時所持的「延續性」(continuity)觀點(Schement and Lievrouw, 1987; Schiller, 1981; Turow, 1990)，韋伯斯特堅稱：權力、資源與不平等，這三者依然事關重要。對於這項堅持，讀者亦應將自己的想法與之相印證。

在社會發生變遷時，「研究」及「學術」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此，我們意欲再提出最後一項看法。在新媒介研究中及在大眾文化中(從更廣泛的範圍來看)，有一項歷時長久的主題，亦即社會與科技方面的變遷，若與資訊傳播科技連繫在一



起，其變遷步伐以及變遷的迫切程度為何。圍繞著新媒介而產生的誇大之辭，通常已經足以讓學術界用懷疑的態度來發出回應：即便見到了社會變遷，我們亦難以對這種變遷進行瞭解；即便能瞭解這種變遷，亦難對其進行測量及評估。然而，對於新媒介所受到的政治及經濟方面管理，學者若想尋找方法來加以批評、干預，或造成進一步影響，上述警覺亦意謂著一項挑戰。在評估新媒介時，不論就智識或實務而言，我們皆不能忽視所須遵守的嚴格標準，同樣地，當新媒介的問題成為公眾或政治政策的討論事項時，學術界也不能漠視這些問題，否則學術界本身亦會遭到漠視。這並不僅僅意謂著「學術標準」必須與「政策干預」進行妥協。這種妥協的情形，也反映了長久以來存在於媒介及傳播研究中的辯論，亦即：所謂的「行政研究」傳統(administrative research)以及「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傳統(Lazarfield, 1941; Levy and Gurevitch, 1994；參見 Ferment in the Field, 1983)。從事新媒介研究的學者終將會問：主動地對社會及科技變遷進行形塑，是否為研究者的責任？抑或應以純粹旁觀者的立場來評估社會形塑過程為宜？進行新媒介研究之後所獲得的知識，是否用於裨益有力人士或是既得利益者的策略活動？抑或用來對這些人士進行批判？公眾的利益要如何才能得到關照？

## 參考書目

- Abercrombie, N. and Longhurst, B.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 Agre, P. (2004) 'Internet research: For and against', in M. Consalvo et al. (eds), *Internet Research Annual*, Volume 1. New York: Peter Lang, pp. 25-36.
- Alexander, J. C., Giesen, B., Munch, R and Smelser, N. J. (eds) (1987) *The Micro-macro Lin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ng, I. (1990) *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London: Routledge.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ll-Rokeach, S. J. and Reardon, K. (1988) 'Monologue, dialogue, and telelog: Comparing an emergent form of communication with traditional forms', in R. P. Hawkins, J. M. Wiemann, and S. Pingree (eds), *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rging Mas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135-61.
- Boczkowski, P. J. (2004) *Digitizing the News Innovation in Online Newspap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oczkowski, P. and Lievrouw, L. A. (forthcoming) 'Bridging S&T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Research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E. J. Hackett, O. Amsterdamska, M. Lynch, and I. Wajcman (eds), *New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olter, J. D. and Grusin, R. (1999)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ryant, J. and Street, R. L. Jr. (1988) 'From reactivity to activity and action: An evolving concept and *Weltanschauung* in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R. P. Hawkins, J. M. Wiemann and S. Pingree (eds), *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rging Mas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162-90.
- Bucy, E. P. and Newhagen, J. E. (eds) (2004) *Media Acces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New Technology Us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Castells, M. (2002)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OUP.
- Coleman, S. (2004) 'Blogs as listening posts rather than soapboxes', in R. Ferguson and M. Howell (eds), *Political Blogs: Craze or Convention*. London: Hansard Society.
- Compaine, B. M. (ed.) (2001) *The Digital Divide: Facing a Crisis or Creating a Myth?*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 Ferment in the Field (1983)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3), summer.
- Fomas, J. (2002) 'Passages across thresholds: Into the borderlands of mediation', *Convergence*, 8 (4): 89-106.
- Gandy, O. H. (2002) 'The real digital divide: Citizens versus consumers', in L. Lievrouw and S.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London: Sage, pp. 448-600.

- Gee, J. P. (2003) *What Video Games Have to Teach Us About Learning and Liter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olding, P. (2000) 'Forthcoming featur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future', *Sociology*, 34 (1): 165-84.
- Gray, A. (1999) 'Audience and reception research in retrospect: The trouble with audiences', in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London: Sage, pp. 22-37.
- Hartley, J. (1988) 'The real world of audiences', *Critical Response*, 5 (3): 234-43.
- Huberman, B. A. (2000) *The Laws of the Web: Patterns in the Ecology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llner, D. (2002) 'New media and new literacies: Reconstructing education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 L. A. Lievrouw and S. Livingstone (eds), *The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London: Sage, pp. 90-104.
- Kress, C.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 Latour, B. (1991)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in J. Law (ed.),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103-31.
- Lazarfeld, P. F. (1941)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 2-16.
- Levy, M. R. and Curevitch, M. (eds) (1994) *Defining Media Studies: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evrouw, L. A. (2000)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universal servic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6 (2): 155-9.
- Lievrouw, L. A. (2001) 'New media and the "pluralization of life-worlds": A role for information in social differenti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 3 (1): 7-28.
- Lievrouw, L. A. (2004) 'What's changed about new media? Introduction to the fifth anniversary issue', *New Media & Society*, 6 (1): 9-15.
- Lievrouw, L. A. and Farb, S. E. (2003) 'Information and social equity',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7: 499-540.
- Lievrouw, L. A. and Finn, T. A. (1990) 'Identifying the common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s Model', in Brent D. Ruben and Leah A. Lievrouw (eds), *Medi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Behavior*, volume 3.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p. 37-65.
- Lievrouw, L. A. and Livingstone, S. (2002) 'Introduction: The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new media', in L. A. Lievrouw and S.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London: Sage, pp. 1-15.

- Light, J. (2001)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1 (4): 7 10-34.
- Ling, R. (2004) *The Mobile Connection: The Cell Phone's Impact on Society*. San Francisco: Elsevier.
- Livingstone, S. (2002) *Young People and New Media: Childhood and the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London: Sage.
- Livingstone, S. (2004a) 'Media liter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mmunication Review*, 7: 3-14.
- Livingstone, S. (2004b) 'The challenge of changing audiences: Or, what is the audience researcher to do in the internet ag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1): 75-86.
- Livingstone, S. (ed.) (2005) *Audiences and Publics: When Cultural Engagement Matters for the Public Sphere*. Bristol: Intellect Press.
- Livingstone, S. (in press) 'Critical debates in internet studies: Reflections on an emerging field', in J. Curran and M. Curevi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n. London: HodderArnold.
- Loader, B. (ed.) (1998) *Cyberspace Divide: Equality, Agency and Polic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Luke, C. (1989) *Pedagogy, Printing and Protestantism: The Discourse of Childhood*.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acKenzie, D. and Wajcman, J. (eds) (1999)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2nd ed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nguel, A. (1996) *A History of Reading*. New York: Penguin.
- Manovich, L.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 Murdock, C. (2002) 'Review Article: Debating digital divid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3): 385-90.
-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1995, July)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Have Not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RL (consulted April 13, 2005):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fallingthru.html>.
-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1998, July)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II: New Data on the Digital Divid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RL (consulted April 13, 2005):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net2/falling.html>.
- Norris, P. (2001)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ster, M.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faeli, S. (1988) 'Interactivity: From new media to communication', in R. P. Hawkins, J. M. Wiemann and S. Pingree (eds), *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 Merging Mas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p. 110-34.
- Reeves, B. and Nass, C. (1996) *The Media Equation: How People Treat Computer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Like Real People and Places*. Stanford, CA: CSLI,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e, R. E. and Associates (eds) (1984)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ogers, E. M. (1986)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Rogers, E. M. and Kincaid, D. L. (1981)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 Sawhney, H. and Barnett, G. A. (eds) (1999)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 XV: Advances in Telecommunications*. Stamford, CT: Ablex.
- Schement, J. R. and Lievrouw, L. A. (1987)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research', in J. R. Schement and L. A. Lievrouw (eds), *Competing Visions, Complex Realities: Social Aspec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Norwood, NJ: Ablex, pp. 1-10.
- Schiller, H. I. (1981) *Who Knows: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Norwood, NJ: Ablex.
- Selwyn, N. (2004)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and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and Society*, 6 (3): 341-62.
- Silverstone, R. (2005) 'Med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Craig Calhoun, Chris Rojek and Bryan S. Turn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ociology*. London: Sage.
- Smythe, D. (1981)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pp. 22-51.
- Stone, A. R. (1995) *The War of Desire and Technology at the Close of the Mechanical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Turov, J. (1990)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 as a concept', in B. Rubin and L. A. Lievrouw (eds), *Medi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Behavior*, volume 2.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p. 9-19.
- Verhulst, S. (2005) Analysis into the Social Implication of Mediation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Draft position paper for the MIT-OIL Joint Workshop, *New Approaches*

- to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April 15-16, 2005. <http://www.oii.ox.ac.uk>
- Warschauer, M. (2003)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the Digital Divi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ellman, B. (2004) 'The three ages of Internet studies: Ten, five and zero years ago', *New Media and Society*, 6 (1): 123-9.
- Weilman, B., and Haythornwaite, C. (2002)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Blackwell.
-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 Woolgar, S. (2002) 'Five rules of virtuality', in S. Woolgar (ed.), *Virtual Society? Technology, Cyberbole, Reality*. Oxford: OUP, pp. 1-22.